

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的文化轨迹

——《历史和阶级意识》与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之比较

冯宪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建构和发展的重要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19世纪相继谢世，而他们的伟大学说在20世纪却得到了发扬光大。当然，在20世纪有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假马克思主义之名的非马克思主义，然而继承马克思的学说，试图在发展变化了的环境中，按照马克思留下的理论遗产，来回答20世纪社会现实的新问题，开拓新境界的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梳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复杂多样的理论历程，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20世纪初叶，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同时也建构了一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后来传播到所有相继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领域之中，成为这些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本文现在研究的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轨迹，主要是从1923年以来，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发表为标志而产生、延续下来的非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的演变。

关于这一类非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过去在中国存在，现在这种争论实际上也还没有得出一致结论。那么，从学术上讲，判定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没有一些可以设定的基本标准呢？有些人认为是有的。比如，英国理论家马尔赫恩说：“‘马克思主义’可以用恩格斯晚年所用的那些方式来表述：（1）关于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生产方式发展的形式、危机和变形、人类历史中生产方式的结构作用；（2）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资本主义主要的阶级以及它们之间的对抗、工人阶级反抗资本的斗争之间的有机关系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可能性。这些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构成性主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结构得以

产生的‘真正基础’。它们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题目的最低标准，是马克思主义使自身更富有意义，从而确认一种连续的传统的核心因素。”^① 马尔赫恩这里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底线，是根据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第三部分的论述归纳出来的。按照恩格斯的说法，生产方式是人类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从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就必然提出无产阶级在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将取得社会权力的历史使命。而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可以说，马尔赫恩提出的这样的底线，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思想的。

由 1923 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问世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到 1985 年出版、2001 年再版的拉克劳、墨菲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所标志的后马克思主义，这些著作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讨论环节中都是反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而从其理论的根本指向来看，是坚决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召唤无产阶级运动走向革命的新的前进目标的。它们显然牢固地站立在马尔赫恩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底线上。美国学者凯尔纳说：“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总体性和首要关注商品和经济生产的视野，提供了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揭示推翻这个社会的无产阶级的力量的最好的方法论工具。”“卢卡奇声称，工人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社会问题的解答”。^② 而“拉克劳、墨菲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战略》构成了一种有影响的后马克思主义视野，批判正统模式，发展建基于‘新社会运动’的‘激进民主’模式”。^③ 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写《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卢卡奇和写《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的拉克劳、墨菲，他们的某些哲学观点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相左，就认为他们统统不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在 20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巨大理论活力的表现，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构成了在国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总体格局中马克思主义文化不断发展的奇观，这也进一步证实了萨特所说，“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

^① [英] 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引言第 1 页。

^② Douglas Kellner, *Western Marxism*, in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edited by Austin Harringt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56—157.

^③ Douglas Kellner, *Western Marxism*, in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edited by Austin Harringt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71.

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①。

萨特所言指出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社会历史基础，就是马克思所科学地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危机，依然存在，没有得到任何改变。这样的历史时代并没有结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仍然是我们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指南。而萨特没有讲到的另一方面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包括萨特本人所张扬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发展，也同时得力于对于不断演进的西方当代文化思想、潮流的审时度势的合理吸收、兼收并蓄。如果国外马克思主义拒绝吸收当代西方文化发展的可资利用的成果，把自己孤立在西方当代文化之外，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马尔赫恩说到了这一点。他说：“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必然是论述社会历史结构和进程中的生产方式及其功能。这是马克思主义自己的权利，也是它自己规定的局限：首先，它坚持对所有有关的社会事物做批判性审查；其次，它没有能力在自己观念资源的范围内，产生有关社会的一种详尽无遗的知识。马克思主义总是有意无意地借鉴其他的各种知识。”^②马克思主义“坚持对所有有关的社会事物做批判性审查”，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必然可以对社会的一切方面进行研究和解释，比如文化是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研究和解释文化的基本原则，但是，它不可能提供关于文化的所有方面的详尽的知识。并且，比之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经济、社会的研究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对于文化的研究和解释相对少一些。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考茨基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影响下，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理论。“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出现了。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注经济和政治，而新一代的十月革命以后的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发展马克思的文化、国家、社会组织、心理学等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系统研究的理论，以适应新的时代。”^③应该说，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留下了鲜明的文化轨迹，研究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活力。

对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文化轨迹的研究可以有多种视角、多个

^① [法]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林骧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② [英] 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引言第20页。

^③ Douglas Kellner, *Western Marxism, in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edited by Austin Harringt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55.

问题，本文认为，从开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到代表后马克思主义的拉克劳、墨菲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大体上依循西方整体文化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的发展轨迹。这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发展的背景。

19世纪中期，欧洲自然科学有了很大进步，出现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概括的三大重要科学发现，即由焦耳等对热的当量的发现所导致的能量守恒与转化的证明，施旺和施莱登等发现有机细胞是有机体繁殖和成长的单位从而奠定了对生命物的研究基础，和达尔文建立的生物进化论。这些科学发现使人们能够理性地解释长期以来始终感到神秘的自然界，科学对自然解释，特别是对生命发展的解释所取得的成功，树立了人们对科学能够认知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信心。19世纪晚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去世，而他们的信仰者在不遗余力地扩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影响，并且将他们的理论系统化、“主义”化时，所处的时代的文化境遇就是这种科学文化昌明，将科学神圣化的时代，人们甚至认为，可以依赖自然科学模式，利用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对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建立一种在方法上统一、结构上完整的无所不能的知识模式。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是在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引导下，进行最初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的。第二国际的领袖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从认识方式来看，也是认为既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定胜利是一种“铁的历史规律”，那么随着社会“科学”地、必然地发展，社会主义胜利的情景就像细胞使生命成长、环境使生物进化一样，也必然会自然发生。

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出版，固然是作者对20世纪初欧洲无产阶级武装斗争革命失败的反思，同时也是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纳入社会、文化现代化潮流进程中的一种理论阐释。卢卡奇一改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实证主义理论方法，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恢复马克思哲学中的辩证法。卢卡奇全书这样的论述，其实是宣示离开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引导的立场，回归黑格尔辩证法内在地包孕着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副标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要辩证法，不要实证主义，是全书的一个根本思想。这是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宣言。卢卡奇自己也许并没有预料到，他的这本争议颇多的著作，成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入门必读书籍，被雅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

20世纪西方文化从现代走向后现代，这是国内外学界的共识。这种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的文化趋势始终都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语境中呈

现的。马克思的思想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超越的历史地平线，因此马克思的著作，既与启蒙理性有着深刻的联系，凝结着文化现代性的话语，同时也批判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危机和缺失，昭示着后现代文化的崛起。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演变的过程中，也必然在某一时刻进入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的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出版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现代性话语特征的开端。哈贝马斯是一直坚持文化现代性立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对从康德以来的现代性哲学话语进行了知识谱系的认真梳理。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现代的时代意识及其自我确证的要求”，^①而不是社会现代化的外在目标。康德哲学反映了西方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时代特征，但是他没有完成对现代性的哲学阐释。“黑格尔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黑格尔发现，主体性乃是现代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黑格尔同时阐明了现代世界的优越性及危机所在，即这是一个进步与异化精神共存的世界。”^② 马克思哲学中也具有现代性的主体性精神，与康德、黑格尔强调主体即作为人类共同体的普遍的人不同的是，马克思关注的、想要解放的主体首先是无产阶级，是劳动的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观念与康德、黑格尔现代性概念不同的地方。但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康德、黑格尔的启蒙现代性的主体性思想是有所吸收的。我一直以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考察人类历史发展有两大基本尺度，一个是生产力发展的尺度；一个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尺度。生产力尺度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尺度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二者结合在一起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面的规律性认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取而代之的新社会则是社会主义社会。而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则可以使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人的发展状况、发展目标。马克思在对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提出了人的发展的三形态理论。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

① [德]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② [德]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0页。

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①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状况体现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水平。在人的发展的第一形态，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极为低下，人的需要受到限制，个人严重依附于某个社会共同体，人的个性展现为原始的丰富性。这个形态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发展。在人的发展的第二形态，社会在全面的、普遍的商品交换中，人类的本质力量得到很大发展，出现全面的社会需求，但是个体的能力和需求则受到社会关系的全面物化，人的发展依赖于物，造成人的片面发展和异化。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发展。只有到了第三形态这个理想目标，个人才具有自由个性，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发展的目标。为此，《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人的发展，特别是作为劳动的人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主体思想的核心。

在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那里，马克思主义成为对社会历史物质结构的一种解释，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遮蔽了对人的主体自由的诉求，完全与启蒙现代性分道扬镳。这就是卢卡奇所说的，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把“历史的客体对象作为永不变更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的客体表现出来。历史成了僵尸”^③。而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则把人这个主体与历史结合起来，把历史理解为人的实践的创造活动的结果，就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回到了启蒙现代性的立场。

哈贝马斯说：“现代性面向未来，追逐新异，可谓前所未有，但它只能在自身内部寻求规范。主体性原则是规范的惟一来源，主体性原则也是现代意识的源头。反思哲学的出发点是自我意识这一基本事实，这是主体性原则的关键。”^④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的理论特点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突出强调了主体性原则，高扬无产阶级的主体性。而这一特点的获取又是在于卢卡奇在“回归马克思”的口号下，主张恢复黑格尔的辩证法。卢卡奇说，第二国际理论家“为了‘科学的精确’，把所有黑格尔辩证法的痕迹都系统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中清除了”“他们没有注意到马克思的整个系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③ [匈]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

^④ [德]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主要的重大范畴和经常使用的范畴都直接地起源于黑格尔的《逻辑学》^①。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有根本区别，马克思在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观察历史的时候，“强烈地要求我们要把‘感性世界’、客体、现实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这就意味着，人必须认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同时是社会的主体和客体”^②。而这里就贯穿着黑格尔的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黑格尔主体性原则的要义在于人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证，这正如哈贝马斯所说：“黑格尔开创了现代性的话语。他首先提出了现代性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证的问题，创立了启蒙辩证法原则，而有了这个原则，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就能做到万变不离其宗。”^③因此，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就是把黑格尔的现代性话语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标志。

现代性的主体性是主体自我的结构关系。黑格尔说：“说到底，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也就是说，精神总体性中关键的方方面面都应该得到充分的发挥。”^④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突出地强调了主体的自由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他说：“只有主体（意识、思维）同时是辩证过程的制造者和产品，只有作为结果的主体在它的意识的形式是在自我制造中运动，只有当这个世界用全部客观把自己加在主体上，只有到那时辩证法的问题以及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的矛盾的扬弃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⑤马克思主义就是“具体地发现‘作为主体的真理’”。^⑥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是无产阶级作为主体过程的真理。卢卡奇的这本书的主旨是揭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使用的方法是马克思来自黑格尔的辩证法。这样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贯穿着黑格尔开创的现代性话语。

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就是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论述的发挥。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被蒙蔽，是对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出卖劳动力的商品这一事实麻木不仁，工人就单方面地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客观地转变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客体，而不可能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只有当工人具有自我反思能力时，当工人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商品而存在时，他才开始具有主体意识，才能认

① [匈]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② [匈]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③ [德]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④ 转引自 [德]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⑤ [匈]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⑥ [匈]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识社会存在本身。卢卡奇指出，“马克思在一些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关于商品拜物教的性质的章节中，概括了他的全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以及被看成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先于它的社会）的认识的无产阶级的全部自我认识”^①。由于工人中间物化意识较为严重，阶级意识没有真正地树立起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首要任务不是急于发动武装起义，而是要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意识形态的文化批判，使工人摆脱物化意识的影响，认识自己的阶级地位和阶级使命。这样一种使无产阶级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证的辩证思考，就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物化工人的异化现实，又批判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官僚体制失落工人主体性的弊端，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特点和注重文化研究的发展思路。而哈贝马斯说，这正是在 20 世纪延续了黑格尔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他说，在 19 世纪到 20 世纪之交，黑格尔的现代性的话语一度被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潮流所中断，“这种状况到了 20 世纪才有了变化。海德格尔再一次把现代性话语引入真正的哲学思想运动当中，书名《存在与时间》证明了这一点。对黑格尔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而言，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借助于马克斯·韦伯，把《资本论》转译成为一种物化理论，并重建了经济与哲学之间的联系。哲学沿着科学批判的路径，重新获得诊断时代的力量”^②。显然，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

星移斗转，时代变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探索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中间经过若干挫折，终于在 1968 年法国巴黎的学生和工人运动中，看到了革命的踪影。1000 万人走上街头，对一个欧洲资本主义强国的政权提出挑战，达到了人民革命的临界点。可是，这一场革命运动在上演了一个多月以后就悄然落幕，之后的情景，诚如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文中所言，“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资本主义社会恢复了昔日的繁华和秩序。1968 年 5 月毕竟是一个失败。政治失败带来的沮丧，使美国学者安德鲁·莱文说：“至少从 1968 年事件的分水岭算起，无论是东欧还是西欧，马克思主义政治已陷入危机之中。”^③而在 1968 年的学生运动的失败的危机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新的思考打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遵循的哲

① [匈]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92—193 页。

② [德]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年版，第 61 页。

③ [美] 安德鲁·莱文：《什么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载 [加] 罗伯特·韦尔等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6 页。

学现代性路径。革命失败之后，自由的梦想并没有被放弃，“不那么浪漫极左的思想家，无疑将努力发明一种新版的关于‘内在批判’的标准概念，他们确信它存在于重视开放并以一定的方式实践开放的现存制度的逻辑中，并且可以用来逐渐浸湿它。对于内在批判的传统概念来说，正是这一制度在结构上与自己不同的那些地方，它被一种可以替代它的政治前途的阴影挖空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内在’与‘外在’的区别被解构了”^①。1968年以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构实践首先指向了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所赖以成名的总体性理论基础。这是国外马克思主义走向后现代的一次重要转折。

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的理论基础是总体性的辩证法，这是黑格尔现代性思想的一种标志。卢卡奇在书中反复强调，“总体性范畴不仅决定着认识的客体，而且也决定着认识的主体”“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体系、立场都归结为这样的原则：革命是占统治地位的总体性范畴的观点的产物”^②。1968年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前期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颠覆首先就是对总体性范畴的反思、批判和摒弃。伊格尔顿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社会总体性都是一个幻想”“总体性的概念意味着一个它要对其发挥某种实践作用的主体，但是一旦这样一个主体已经被击败、被收编、被粉碎或者被变形，不存在了，那么总体性的概念就很有可能和它一起完结”^③。卢卡奇的总体性文化哲学观念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统一性，特别是人类走向共同的人性完善发展目标的乌托邦之上的，列斐伏尔在《辩证唯物主义》（1938年）中指出：“对于希望真正解决问题的人来说，可以走的路只有一条，即努力把握总体内容。”^④ 马克思主义在总体性哲学中从人道主义角度去把握总体的人，无产阶级的自身解放就是走向总体的人。“在这种人道主义中，最高的权力机关不是社会，而是总体的人。总体的人是自由集体中自由的个人，它是在差别无穷的各种可能的个性中充分发展的个性。”^⑤ 总体性和现代性的其他基本概念一样都是理性的形而上学公式，在其思辨的理性历程中，把生活世界简化为同质性事物，抽象化并且压抑了感性生活世界的一切层面，成为抽象思辨的本质主义的单一决定原则。戴维·哈

① [英]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想》，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页。

②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2—33页。

③ [英]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想》，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页。

④ 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⑤ 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

维指出，与此相反，“后现代主义将特权赋予了‘异质性和差异，它们是重新界定文化话语的解放力量’。分裂、不确定性，对一切普遍的或‘总体化的’话语（为了使用受偏爱的词语）的强烈不信任，成了后现代主义的标志”^①。

以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所坚持的总体性辩证法，说到底就是坚持传统形而上学始终通过同一性逻辑来建构一种精神总体、社会主体的真理体系。但是，这种总体性概念始终无法逾越解释现实世界所存在的诸种矛盾的对抗、不均衡、不协调、不同一的常态存在。总体性理论在理解现实世界时出现了无法建立合理性的尴尬。在国外马克思主义中，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就提出了总体性的启蒙理性走向自身反面并且与现实自身发展悖离的问题。而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则“对辩证法的表述形态也必然会丧失其总体性的逻辑体系，成为一种解构式的、反体系的、不断打破自身凝固化的否定性思想活动”^②。在1960年代法国阿尔都塞理论的崛起，又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后现代思潮靠拢。阿尔都塞和罗兰·巴特一样是一个从法国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家。阿尔都塞的学生巴利巴尔在阿尔都塞的成名作《保卫马克思》的1996年重版序言中指出：“书中的第二个概念是围绕着结构概念而构成的，它同样追溯至系统统一体或‘总体性’观念，不过这一观念只以完全内在的方式，或者以一种不可区分的严格的‘缺席因’的方式在其结果中被给出。”“这里重要的问题是，问题中的多样性是一种实践的多样性。给各种实践的总体一个结构，就正是给予各种实践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可理解性。阿尔都塞告诉我们，各种事件仅仅以必然的和不可还原的多元决定的方式相互作用，没有任何‘复杂性的还原’可以在这种多元决定之外，发现线性决定论的简单性。”^③阿尔都塞就是用多元决定论解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包括卢卡奇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的同一性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后结构主义。这些不间断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长期依循的卢卡奇的总体性的质疑和反思、解构，就使得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越卢卡奇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向后马克思主义。

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称谓和界定，目前还有不少争论。而英国专门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斯图亚特·西姆说：“当今，后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奠定其理论地位，得力于后马的主要理论家拉克劳和墨菲力挽马克思主义20世纪晚

①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页。

②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二卷《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哲学文本解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③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序言第X页。

期在全球文化和政治力量的颓势，获取新的意义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文化环境。”^①因此，当今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被视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其地位与当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相仿。比较一下这两部著作，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 20 世纪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的文化态势的研究是很有理论意义的。

拉克劳和墨菲并不是首先举起后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人，但是国外学者认为，正是他们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概括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主题和最终结论，成为最为深刻的后马克思主义著作。拉克劳和墨菲确实把诸多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散、零碎的观点集合为一个整体，表现出后马克思主义在越出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的界限之外，去努力适应当代文化的后现代文化语境，在当代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保留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斯图亚特·西姆说：“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就拉克劳和墨菲的风格来说，就是努力把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之中的新的理论思路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那些经典马克思主义教条不再具有感召力的新的文化环境具有密切联系。”^②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今天的社会和文化态势都与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的时代，有很大区别。卢卡奇的总体性的辩证法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统一的普遍主体，这一理论已经与社会事实大相径庭。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总体性理论，使“具体被还原到抽象，不同的主体立场被还原为单个立场的表现，差异的多样性既被还原也被当成附属的东西加以拒绝，在场的意义通过它在先验演化阶段上的位置被表现”^③。这样，复杂的社会现实就在理论的事业中成为一种单一的同质化的实体。他们指出，“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特征”消解了总体性“空洞化的完美整体和同质化集体意志的幻想前景”，抛弃了“充满普遍主体和围绕单数形式概念化的虚构”。^④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已经不限于无产阶级反抗资本家的斗争，“新兴起的女权主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和性少数的抗议运动，人口边缘阶层发动的反制度化生态斗争，反核运动，资本主义外围国家非典型化的社会斗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社会斗争存在于更广阔的区域范围，它们正在开创潜在的，而且是更自由地走

①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outledge, 2000, P. 1.

②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 Reader*, Edinburgh University, 1998, P. 2.

③ [英] 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0 页。

④ [英] 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 页。

向民主和平等社会的趋向”^①。差异性是后现代主义颠覆现代性同一性观念的重要理论尺度。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斗争不是一个单纯地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问题。拉克劳和墨菲强调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的多元性在于，政治的含义并不是单纯的执掌国家政权的斗争，因此争取社会发展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是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广泛领域的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政治主体不可能单纯地按照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决定，应该在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中全面发现和认识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各种各样的政治主体。政治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集中地体现为个体的权利，任何维护个人权利的合法化行为都具有政治意义。这样就形成了许多新的政治主体和新的政治斗争。拉克劳和墨菲指出：“涉及到对不同主体立场之间关系的理解形式，在这些理解形式中我们的分析倾向是去总体化。”^② 按照去总体化的思路，他们竭力主张在广泛和多元的新社会运动中去发现社会主义斗争的多样性主体。拉克劳说：“工人阶级的斗争，妇女的、同性恋者的、边缘人口的及第三世界民众的种种斗争，势必产生这样的结果：通过它们特定的谱系式的努力而建构起它们各自的传统的重新挪用。当然，这意味着根本不存在在结构层面上被先验规定的中心性，原因很简单：原本就没有什么大写历史的理性基础。”^③ 这正如凯尔纳等所说，拉克劳和墨菲，“他们著作中的后现代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差异、多样性、非层级化话语逻辑的采用”，要想达到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而准确的理解，“就必须‘从一种非本质主义的视角出发’，把社会、理性及主体性看成是偶然的推论性产物”。^④ 后马克思主义所宣称的对差异性的坚持和对总体性的解构，明显地表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后现代文化的痕迹。

拉克劳说：“‘后现代状况’要质疑的东西，与其说是各种社会文化认同的抉择及不公平对待，还不如说是建构这些认同的逻辑原则及地位。”^⑤ 由卢卡奇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论，把无产阶级主体的阶级意识

^① [英] 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② [英] 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③ [英] 拉克劳：《政治与现代性的局限》，周凡译，载周凡等主编：《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页。

^④ [美] 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⑤ [英] 拉克劳：《政治与现代性的局限》，周凡译，载周凡等主编：《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作为解决社会总体根本矛盾的关键。而后马克思主义消解这个总体性的革命主体的理论根据则是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遵循的生产关系决定论。他们把这一理论看成为把社会本质确定为经济的本质主义理论。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摒弃了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取而代之的是葛兰西的领导权（hegemony，又译为霸权）。对“领导权”这一概念的选择是拉克劳和墨菲对福柯后现代的知识谱系学的一种移植和借鉴。福柯的知识谱系学的任务是恢复被总体化的叙事中压抑的自主话语、知识和声音。《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的第一章的标题就是《领导权：概念的谱系》。拉克劳和墨菲对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做了一种知识谱系学的考察。他们建立了领导权概念的知识谱系学，揭示了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所具有的不同含义。经过一番考察，他们认为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的可取之处是意识形态因素的连接（articulation）原则。具体的历史形态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地位的形成是多样化的，意识形态并不是通过强权、专制的手段而归于的统一，也不是支配型意识形态向多元化主体的强行灌输，而是依靠话语实践连接不同意识形态，使这些分散、异质的意识形态自愿地认同其从属地位，达到道德上、思想上和智识上的文化领导权。这是通过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不同的身份认同、主体立场、社会部门、运动和斗争的话语实践，以一种普遍形式或整体形式对不同意识形态加以整合的过程。据他们说，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中的连接原则是长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被遮蔽的思想，他们就在对于领导权的知识谱系学的考察中把它发掘出来。“马克思主义传统内话语领域的系统发现经历了新实体和新范畴生成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通过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的累积式的丰富而延长他们的寿命，而是把一种从逻辑上不可整合的补充物填入其中，这种植入以德里达称之为‘增补性逻辑’——使对立状态模糊化的铰和式话语作用——的方式进行。”^①这说明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在理论上的突出特点，都是在后现代思维和方法的运作中取得的，充分表现了后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后现代文化背景。

通过这种粗略的考察，从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到拉克劳、墨菲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其间的知识话语的演变，可以看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遵循着西方整体文化发展的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轨迹。这正如伊格尔顿所说，“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历史布满了自我反思的行动，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们力求掌握关于他们自己的信条可能实现的某些历史条件”。^② 我们

^① [英] 拉克劳：《政治与现代性的局限》，周凡译，载周凡等主编：《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② [英] 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想》，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4页。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宏观上不能脱离西方文化的整体语境。当然，后马克思主义不能简单地划归为后现代主义理论，不能简单地只看到后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后现代文化因素，实际上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坚持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也是在整体上拒绝对后现代主义的全盘接受的。“在这个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外在于马克思主义，因为，后马克思主义必须积极介入到马克思主义历史中、必须介入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范畴的讨论中。”^① 这就是说，只要后马克思主义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底线，那么它也就不可避免地回到马克思的现代性话语中。这正如拉克劳所说，“人类一直顺从于外在力量：上帝、自然以及历史的必然规律，如今，它跨入了后现代性的门槛，第一次开始把自己视为历史的创造者和建构者。基础神话的消解——以及随之而来的‘主体’范畴的消解——把启蒙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解放的可能性进一步激进化了”^②。后马克思主义对后现代性的吸收，用以解构社会、主体的总体性神话，在他们自己看来，又是对启蒙理性和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的现代性目标的真正的接近。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文化轨迹一方面从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这一点也是在讨论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应该注意的。

① [英] 拉克劳：《政治与现代性的局限》，周凡译，载周凡等主编：《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② [英] 拉克劳：《政治与现代性的局限》，周凡译，载周凡等主编：《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